

重读經典

新时代重要文献选读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2月1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这篇重要文献首先着重归纳和分析了当时党内损害党中央权威的主要现象，继而阐释了维护党中央权威与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全党科学理解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同损害党中央权威现象作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得到大发展。但是，在这一路高歌猛进中，也存在一些不和谐之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的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有的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有的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这些现象严重地侵

汇聚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读习近平总书记《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

□ 胡承槐

蚀着党中央的权威，破坏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妨碍着民主集中制体制、机制的正常运转，损害党的威信，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须坚决予以克服。

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现象作斗争，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维护党中央权威同维护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

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题中应有之义。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可以通过组织和思想两个层面体现出来。首先，在组织层面，民主体现在个人的主体性及其权利、地位平等上，民主是集中得以构成的逻辑起点和活动起点，集中则是民主活动行进的合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里，一方面，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个体都不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殊权利；另一方面，党作为党员的集合体所自然产生的组织权力又是高于任何个人权利的，故而，个人服从组织及其组织的一系列规则，是民主和集中的必然要求。由于组织是分层的，个人与组织之间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又进一步转化为上下级组织之间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下级服从上级是上下级组织之间民主与集中的必然要求。进而，不论是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维度上，还是在组织的上下级关系维度上，党中央权威都来自于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自身逻辑的必然结果。党中央的权威，是全党整体权威的集中体现，确立、

保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确立、保证和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

其次，在思想层面，一方面，民主表现为个人的思想意志是党或国家共同思想意志的来源和土壤，集中则表现为个人思想意志的聚集和整合，民主是起点、基础和前提，集中则是民主行进过程的不断累积、结果和终点。在这里，民主保证着集中的民主性。另一方面，党和国家的共同意志如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如党章、宪法等一旦生成，又成为民主活动的准则和起点，并保证着民主活动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在这里，集中保证着民主的有序性、向心性、共同整体性。进而，不论是从民主的维度还是从集中的维度来说，党中央的思想意志都代表着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共同的思想意志，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思想意志的权威，也意味着确立和维护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意志的权威。

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在这一原则和制度安排下，党中央权威始终处于关键位置，确立、维护党中央权威，既是民主集

中制原则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又是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以贯彻执行、正常有序运转的重要一环。

科学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党中央权威是民主集中制内在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科学贯彻民主集中制，只有科学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真正切实维护好党中央权威。

首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一切重大决策部署，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要充分听取全国上下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多次的酝酿和反复的讨论，在吸取各方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基础上，生成党和国家的共同意志。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但是，一旦党中央作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

其次，依照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and 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权威的真实表现在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并将它切实贯彻落实到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的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自觉成为党中央确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的拥护者、响应者、宣传者、实行者，将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成就，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现实福祉。

最后，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在思想意识上的敌对者，每时每刻干扰和侵蚀着有序民主的正常行进，侵蚀和消解着党中央权威，它们出现在哪个层级，就在哪个层级妨碍着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妨碍干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为此，我们要进一步确立和加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理论自觉，进一步确立和加强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的思想理论自觉，强化党性修养，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查找差距、改进提高，认真检身正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化组织观念，对党忠诚老实。我们要弘扬良好党内政治文化，自觉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是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重大的理论认识问题，全党上下都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科学理解两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治学之道

□ 王晓兵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东汉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百家之言，用30年精力写成无神论著作《论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王充《论衡》实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论衡》是王充反对迷信、祛除虚妄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他在治学方面敢于质疑、求真务实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鉴价值。

勤学好问

人的能力、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而后天的学习，需要“学”，更需要“问”。王充在《论衡·实知篇》中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的才能有高有低，只有学习才能懂得世间的道理，不请教发问就难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学之乃知”，强调的是学习的重要性。“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强调人应该勤奋好学，“且死不休”。他在《论衡·感虚篇》中说：“寒不累时则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寒冷不积累一段时间，不会下霜；温暖持续一段时间，冰雪才会融化。做学问同样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问不识”，则强调在治学中“问”的重要性。“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即使聪明智慧的人，不学习也不会懂得，不求教也不会明白。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提到，“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鲁象玉石切磋琢磨也”。人通过勤学好问获得知识并取得成就，就像骨头、象牙、玉、石需要经过精心的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一样。做学问需要不断地向他人请教研讨，不能闭门造车。

博涉古今

王充主张做学问要博览百家、海纳百川。在《论衡·别通篇》中，他说：“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强调学习要涉广博通，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尤其如此，只有博涉古今、兼通百家，才能成为博学鸿儒。

“人不博览者，不闻今古，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痛者也。”王充认为，不博览群书的人，不了解古代和现代，看不到事物的整体，不知道是对是错，就像眼睛瞎、耳朵聋、鼻子失去嗅觉的人一样。治学者只有了解古今，今以古鉴、古为今用，才能明晓事理、学以致用。王充还强调治学不仅要学得广，还要学得深。他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迹达到的地方不同，所能见到的事物也是完全不同的，治学一样也需要学得广、钻得深，才能获得更深厚的学问。

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年少时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勤奋好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他喜欢遍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反对信守一家之言。他认为“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不博览古今圣哲的著作，讲论事情就不能切近事理，只背诵经传、死记章句，不通古今，是做不出真学问的。

敢于“距师”

做学问应该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王充主张破除对所有老师和古人的迷信，要勇于“距师”，敢于问难求解。他在《论衡·问孔篇》中指出，做学问困难的是规避老师错误的教导，正确辨别是非曲直。

汉代儒生治学流行“好信师而是古”的盲从迷信学风，致使“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其中很多是无知的“庸庸之辈”。对此，王充提出要有问难精神，学会“距师”。问难不是一般的提问或请教，而是质疑，是经过潜心思考之后提出个人主张。“距师”则是对老师的见解不盲目附和，不泥古守旧，要敢于力排众议，经过讨论争辩来核定道理，从而做到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王充指出：“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每句话都正确，如果弟子不

知问难，后人又盲目附和，使义理不明，损害的正是圣贤之道。

王充坚持治学要独立思考，绝不能盲从和迷信。在《论衡》中，他对当时流行的充满谶纬迷信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抨击和批判。在当时汉儒学者将先圣先贤的学说奉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非议的境况下，王充敢于问难、“距师”，显得尤为可贵。

学为世用

王充主张学为世用、学用一致，尤其强调写文章要务实尚用，有补于世。他在《论衡·自纪篇》中称：“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认为写作应有益于社会，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

学问贵在能用。王充反对墨守经文章句，主张学习百家之言是为了应用，因为“圣人之言，贤者之语”都是“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有助于治家治国。在《论衡·超奇篇》中，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凡重视通融的人，可贵之处在于能与实际融会贯通，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文章仅仅能够诵读，没有“实际效用”，“虽千篇以上，鸢鹑能言之类也”。

王充特别强调文章要有为而作、因事而发。他在《论衡·对作篇》中指出，贤圣之为文，“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圣人作经艺，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圣人贤者所做的文章，可以匡正挽救不良的风俗，使民众的品行变得质朴淳厚，这正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他反对舞文弄墨之作，在《论衡·佚文篇》中指出，“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写文章不应是为了玩弄笔墨、堆砌辞藻，而应是为“载人之行，传人之名”，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文人之笔，劝善惩恶”的作用。



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提升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仅是解决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有效应对今后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各种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如何理解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意义，如何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治理的内涵，如何深入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针对这些问题，2022年第9期《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约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夏学平在《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指出，大数据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赶超世界强国的历史机遇。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认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意义，把握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实践要求，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数字化发展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数字治理理论体系构建和实践创新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治理的内涵，全面推进我国数字治理实践。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李韬在《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治理的内涵

与实践进展》中指出，数字治理是更广义上的治理，主要是指以数字化赋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建新型治理体系为目标，在政府主导下，平台与企业、社会组织、网络社群、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关事务的制度安排和持续过程。数字治理概念涵盖数字政府治理、数字经济治理、数字社会治理、数字技术治理等，既有“基于数字化的治理”，又有“对数字化的治理”。

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数字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主任、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益民在《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中指出，数字政府建设是一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全方位、系统性改革，是未来我国数字化发展的重点。要准确把握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全面开启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以数字化治理提升经济调节水平，以数字化监管推进现代监管有效性，以数字化服务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以数字化创新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提升领导干部数字素养和数字治理能力，夯实数字政府的安全基础。

健全和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在《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到关键时期，需要在体系构建、治理创新等方面加以改进。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健全完善组织体系、规则体系、方法体系、监督体系等关键子系统；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治理创新，平衡数字生产力与工业化制度的冲突、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网络化与属地管理之间的矛盾。

如何将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提高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劲在《深入推动数字社会创新发

《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22年第9期聚焦
加强和完善数字治理

□ 吕红娟

展》中厘清了数字社会以及相关联的数字社会创新发展的概念，提出未来数字社会发展“三善”理念，即应用普及、群体普适和服务普惠。“应用普及”，是指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应用领域的全过程拓展和全场景进入；“群体普适”，是指数字技术以其特定的普适性和包容度，能够适应各类人群的使用需求，促成全社会的无差别应用；“服务普惠”，是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及其成果，可以由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让所有人感受和享受到数字社会创新发展的先进性和便利性，促成全社会的充分共享。

